

翻译剧本《保尔·柯察金》及演出盛况

1947年,我翻译的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改编的剧本《保尔·柯察金》,曾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。

当时,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送了一批图书,其中有剧本《保尔·柯察金》(打字稿)。那时,我还没有读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这部小说,所以一看到这个剧本,就像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新人,和我们过去见过的人物形象太不同了。他是一个在争取生命、胜利的过程中坚持斗争的青年,不管自己要付出多大牺牲、承受多大的痛苦,他都在不断地克服、不断地向前,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,我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好好睡觉,一口气将剧本读完,我被保尔的精神深深打动了,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催促我把它翻译出来了。保尔,与我过去知道的事情大不一样了。我是在日伪统治下受到的教育,所以对过去的革命历史很不了解。忽然出现这样一个新人,真的很震撼。我要让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,像保尔一样生活和工作。之后不久,我遇到了从延安来的女作家草明。

1947年,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三十周年,中苏友好协举办了一个苏联照片展览,解说词是我译的。草明很认真地看了展览,然后推心置腹地告诉我:“你的汉语语言不纯,应多多学习。”她建议我认真阅读现代进步文学家们的作品,并努力锤炼自己的文字。草明的话使我震惊,我从没有想过自己语言不纯的问题,以为会汉语就可以了。后来,她还就此事给我写了一封信说:“你的语言不规范,有的地方有‘协和语’的味道。”“协和语”就是日本人说话用日语语法排列中国汉语词句的语言表现。

草明是第一位指出我的文字缺少训练的人。我生长在敌伪统治下,受的是奴化教育,草明的话立刻使我意识到日寇对青年心灵甚至语言摧残之深。几十年来,草明的教导一直记在我心中。

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在中国有许多译本,最值得纪念的是第一个译本,从英文转译的,译者的名字叫梅益。

我翻译的剧本《保尔·柯察金》就是根据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改编的,由兆麟书店印刷。1948年,哈尔滨市教师联合会的文工团排演了这部话剧。这是《保尔·柯察金》首次搬上中国舞台。

演出人员都是从日本长期奴役下获得新生的青年男女,大家都怀着一种改造思想和建设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参加了演出。一连演出多日,观众欣喜若狂,因为他们舞台上看到了一种新人。那年的演出成为哈尔滨市解放初期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在剧中扮演冬尼娅的是一个小学代理校长孙杰,由于那次演出,我们相识相爱,后来她成为我的妻子。

翻译家高莽自述



《高莽》
高莽自述 果文川整理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

2017年10月6日,翻译家高莽先生在北京去世,享年九十一岁。高莽是我国俄语翻译界的大家,也是著名的作家、画家,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。《高莽》是他生前自述的回忆录,回顾了他一生的成长道路,回忆他在求学、翻译、创作历程中遇到的人与事,叙述平实,真切动人。

1950年,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以最优秀的演出阵容把《保尔·柯察金》呈现给广大观众。此剧连演多日,场场爆满。当时,《人民日报》《中苏友好》杂志及其他报刊纷纷发表文章,号召青年向保尔学习。保尔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人最崇敬的人物,学习保尔成为社会风气。

当时演出时还有过一段有趣的插曲。扮演保尔的演员金山因事去了天津,演出前他未能按时赶回北京。剧院负责人向观众说明情况,表示道歉,准备改日为这些观众再演专场。可是观众就是不肯散去,在剧场里一直等到金山回来,那时已快到午夜了。《保尔·柯察金》的演出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,可想人们对保尔笃爱之深。

后来,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、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三次将该剧搬上舞台。保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的光辉榜样。

1956年,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赖莎应邀来我国访问。她在全国各地为青年作过多次报告,受到欢迎的场面是用语言难以形容的。我当时为赖莎担任翻译工作。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朴实、诚恳、热情、平常,她像拉家常似的跟我们谈天说地,讲了很多有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。她说:“中国红军长征时,尼古拉可关心形势的发展了。他听广播,还让我在墙上挂了一张中国地图,自己看不见,让我告诉他中国红军行进的路线……”

1957年迎春晚会上,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她。她拉着我们的手,观察了我们良久,然后戏谑地说:“记住,我是你们的媒婆!”她送给我们一张照片,照片上奥斯特洛夫斯基躺在病床上,她关切地守护在他的身旁。在照片的背面她认真地写了一句话:“祝你们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。”

结识恩师戈宝权先生

我第一次见到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、翻译家戈宝权先生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。那是1949年早春时节,有一天,领导通知我,说路过

哈尔滨市的戈宝权同志想和当地的俄苏文学译者、研究者见见面,座谈座谈。那时,“戈宝权”在我的头脑中是位高不可攀的人物,他的译著是我学习的榜样,具有指



高莽

导意义。当时,戈宝权先生肩负着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特殊使命,他被派往莫斯科担任新华社驻苏记者。新中国成立后,根据周恩来总理的任命,戈宝权先生作为新中国驻苏使馆的代表接收了国民党的驻苏使馆,并担任了新中国驻苏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和参赞。

按着指定的时间,我早早地来到了指定的地点。戈宝权先生准时到了。他的穿戴和广大革命干部不一样,大家穿的是黄色军装或蓝色干部服,而他身上是一套西装。他戴着一副近视镜,黑发梳理得非常整齐,脸上露着亲切的微笑。他谈话客客气气,只是浓重的苏北口音使我听起来有些费力。他问其他几位被邀请的人怎么还没有来,我回答不知道还有谁。他取出笔记本,念了几个人名。我茫然不知所措,我仔仔细细看了几遍,然后用颤颤悠悠的声音说:“这些人都到了……那名单上写的都是我的笔名……”

我先后用过的笔名有:雪客、小四、肖儿、竹马、何马、何焉、野婴、野炬、乌兰汗、秀公、海子、谢桃等。戈先生开列名单时,以为是多位译者和研究者,其实他开出的那几个名字都是我的笔名。戈宝权大概感到意外,他没有想到翻译文学作品和撰写有关文章的竟是如此一个毛头小子,更没有想到,他列出的笔名会是我一个人的。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座谈会是否还能开得成。在这么一位名人面前,我屏住呼吸,甚至连气也不敢大声喘了。戈宝权先生

笑了,思考了少许,最后说:“就开一个两个人的座谈会吧!”

那年我二十三岁,很不成熟,与现在的二十三岁青年相比差太多了。戈先生并没有因为出席座谈会的只有我一人而将发言删减省略,或应付几句了事。相反,他讲得津津有味,谈苏联文学现状、谈苏联作家、谈他与苏联文学界的交往,还谈了他自己怎样走上了研究俄苏文学的道路,如何进行诗歌翻译。他让我讲讲自己的情况,我记不得我都说了些什么。告别时,他可能听出我的语文水平不高,文化素质较低,便鼓励我要加强中俄文字修养与锻炼,要刻苦,要勤奋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讲授俄苏文学课,讲授如何治学,讲授翻译的重要意义,而讲课人是大名鼎鼎的戈宝权先生。我觉得,他很了解对方的需要,他把我想知道的、我没有说清楚的和需要知道的事都告诉了我,还指出了我需要努力的方向。我暗自思忖,如果有朝一日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工作该有多好呵!没有想到,几年后,我的希望竟变成了现实。

第二次见到戈先生,是1953年的夏天。当时,我作为一名翻译随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访问。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奔驰,抵达了我向往多年的莫斯科。车站上聚集了很多迎接代表团的苏联人。戈宝权先生也在他们中间,他是作为我国驻苏使馆的代表来欢迎中苏友好代表团的。在这种场合做翻译,我感到紧张。这已不是二人坐在桌前慢慢地用母语交谈,而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,当着他的面,做口头翻译,经受俄语的考验。戈先生居然还认识我,大概意识到我的不安,主动提醒我:“要冷静,要沉着,要认真。”他看了看我,又加了一句:“遇到疑难我会帮助你。”多么温暖的话语,多么亲切的关怀!我如释重负,信心倍增。从那时起,我愿意在他面前从事口译,不怕出丑,因为在工作中可以时时得到他的指导,他随时随地以长辈的体贴口吻,纠正我翻译中的失误或遗漏。他的态度、他的声调,增

强了我工作的勇气与信心。

1954年2月,戈宝权先生离任回国,调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当领导,我则是他管辖下的对外联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。那时,我经常跟随他接待外宾。戈宝权先生知道我喜欢画画,喜欢画速写肖像,特别是文学界人士,所以,他有时会有意地给我留出一点时间来,让我满足自己的心愿。记得有一次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。那天,主客随便交谈,戈先生对我说:“你画吧,我自己与他们随便聊聊。”戈先生的俄语讲得很地道,知识渊博、词汇丰富,只是发音带有江苏家乡的味道。戈先生突然意外地用俄文讲话,使习惯于听我翻译的苏联客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苏联客人以为我只顾作画,不做翻译,便催促我。待我说明之后,他们恍然大悟。

戈宝权先生是学者、是翻译家,他从事学术研究态度严谨,从不投机取巧,更不回避困难。每逢遇到疑难问题,他总是查遍各种书籍,反复向行家请教,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问题。戈先生又十分虚心,不耻下问,有时也找我们商量某字某句的译法,和我们一起探讨学问。有一天,我去看望先生,谈话间他顺手拿出几张纸递给我。我一看,愣住了。原来,他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我发表的《〈阿Q正传〉在苏联》一文,认为有用,又不肯麻烦别人,便亲手抄录了全文。那时,我国还没有复印机。这事使我深为感动。

戈宝权先生是我国介绍、翻译俄苏文学的杰出学者。他接过了鲁迅、瞿秋白、茅盾、曹靖华等老一辈的接力棒,奋力地往前奔跑。在学术领域,他拓宽了研究文化交流的范围,写了不少文章,集成厚厚一本,以《中俄文学交流因缘》为书名问世,其资料之翔实、之丰富,是前无古人的。戈先生的学术活动加深、扩大了与俄苏作家的友谊与交流,很多苏联老作家都认识他,他也悉心保存了他们寄给他的信件、赠书、题词等。几年前,他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南京图书馆,成立了“戈宝权藏书室”,并捐款三万元,设立戈宝权文学奖金。半个多世纪苦心积累的文化财富,如今变成大家可以享用的宝贵资料,显示了他博大无私的胸怀。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为他画的一幅肖像也挂在“戈宝权藏书室”内。

《顶天立地谈信仰——原来党课可以这么上》



徐川等著 定价:39.00元
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出版

在“两学一做”中,南航的徐川将自身的经历和读后感写成《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》一文,文章极具感染力,可读性强,为大众关注,被央视“焦点访谈”报道,被中央认可。本书针对目前党课标签化现象和高校党课缺少吸引力的现状,以思政工作有效性为核心特色,坚持用讲故事的方法讲道理,把学生在入党过程中应该厘清的重要话题讲透讲通;同时面向高校党课教师,尝试提供一本可以作为参考的教学助手,为高校党课的规范化作一些尝试。

发行业务电话:010-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: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(100706) 邮购电话:010-65250042 65289539 网址:
www.peoplepress.net